

不忘初心跟党走，致力为公砥砺前行

——纪念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七十周年

陈昌福

(致公党上海市委，上海 200041)

摘要：从召开“三大”到响应“五一口号”是致公党实现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完整过程。“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致公党最根本的经验。

关键词：“三大”宣言；“五一口号”；致公党“三大”；陈其尤

DOI: 10.3969/J.ISSN.1672-0911.2017.06.051

中图分类号：D66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911(2017)06-0051-07

1946年至1947年间，致公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帮助下，恢复和改组致公党总部并召开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因为它是致公党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里程碑。今年是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70周年，谨撰此文，以示“不忘初心”。

一、恢复致公党总部，准备召开党员大会

中国致公党的前身是美洲致公堂。1925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改堂为党，成立中国致公党。1931年在香港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在香港设立致公党总部。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寇侵占香港，致公党总部被迫停止工作。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争取和平民主，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而蒋介石集团却违背各族人民的意愿，挑起内战，力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力量，建立国民党一党独裁。处在这样

的历史关头，原致公党总部的一些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决心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争取中国的光明前途。

然而，致公党总部的恢复工作并不乐观，可谓困难重重。除文件起草和会务等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外，还面临两大难题亟待破解。

其一，如何恢复与海外，尤其是美洲方面致公党、堂组织的联系。当时的形势是自香港沦陷后，致公党总部实际上已经失去了对美洲党、堂组织的影响力。问题的严重还在于香港这边总部恢复工作尚未启动，美洲的司徒美堂已经在1945年3月11日将“二大”时不欲改党的“全美洲洪门总干部”改组为“中国洪门致公党”，总部设在纽约，全美约有十个支部。加拿大、墨西哥、古巴约有七十余埠之致公堂亦同时改党。1946年初，致公党总部恢复的工作刚刚开始运作，即先后派出肖少石赴美洲进行宣传联络，黄鼎臣到上海与正在组建华侨政党的司徒美堂洽谈合作^[1]。而司徒美堂已经发动全球洪门代表回国组党，并要求国内洪门人士参加。是年七月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致公堂全球恳

收稿日期：2017-08-15

作者简介：陈昌福（1935-），男，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致公党上海市委原副主委，教授。

万方数据

亲大会，经一致决议改定名称为“中国洪门民治党”，简称“民治党”。民治党的组建已在事实上排斥与致公党合作的可能，而肖少石在美洲也遭遇抵制无功而返。不仅如此，刚成立的民治党立即发出第一、二号通告，要求美洲的致公党、堂组织于文到之日一律改称民治党，并向民治党总部缴纳党费。1947年2月10日致公党中央本部刚发出召开“三大”的通知，同时就有消息称民治党将派出该党中央常务委员兼驻粤港菲特派员赵昱赴香港筹组中国民治党华南党部。这对于致公党来说，可谓变生肘腋，岌岌可危！

其二，如何尽快融入聚集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核心层。恢复致公党总部工作是在陈其尤主持下进行的。陈其尤早年就投身革命，参加“三·二九”黄花岗之役，是深得陈炯明信任的粤军部属，与李济深、蒋介石有袍泽之谊。在协助陈炯明的“漳州新政”和治理广东、支持孙中山在南方建立革命政权方面做了不少工作。但陈其尤在致公党内资历不深，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他在致公党内和党派中的声望。据现有资料，1925年10月10日中国致公党总部全体职员合影中，陈其尤不在其列；1926年2月致公党总部以“致公俱乐部”名义迁至香港，而俱乐部的正副主任和委员名单中，没有陈其尤。留存的1931年10月致公党“二大”组建的中央党部成立纪念全体代表合影和1932年10月中国致公党驻港初届职员合影中，均未见陈其尤在列。但不排斥陈其尤因与陈炯明的特殊关系，虽无党内名分，却有参与总部工作的实际。因此，据合理推测，陈其尤最大可能是1933年陈炯明过世后才进入中央干事会，实至名归成为负责人之一。这段时间也正是陈其尤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派驻香港期间，可惜为时不长。1938年因为揭露国民党四大家族发“国难财”的罪行，陈其尤被蒋介石囚禁于息烽集中营，客观上无缘参与当时蓬勃开展的民主宪政运动。1941年陈其尤获释移居重庆，人地两疏，举目无亲，又继续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控，难以有所作为。只是在重庆偶遇黄鼎臣并通过黄鼎臣与中共南方局和其他民主人士有了接触，从而使他“得以不断阅读共产党书报和毛主席言论”。虽然思想认识有了很大提高，但在行动上尚难以与各民主党派一道积极投入在重庆开展的民主政治运动。

52万数据

1945年底陈其尤抵达香港，为了尽快恢复致公党总部，缩短此前致公党与民主党派间的距离，致公党总部在以实际行动积极投身民主政治运动的同时，动员和组织在港的成员为在港民主人士举行联合集会、座谈会乃至为他们寻找居所等做了不少工作。在此基础上，经由李济深的推介，陈其尤得以进入在港民主党派的领导核心层，从而加强了致公党与在港各民主党派之间的联系，促成相互了解和合作，携手踏上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征程。

陈其尤抵达香港后，与在港原致公党总部秘书长陈演生以及严锡煊、钟沃梅等老同志汇合，以陈演生经营的香港九龙弼街汉生隆糕粉厂为活动中心，积极开展恢复总部工作。

从1946年至1947年4月，陈其尤等同志为恢复中国致公党总部、筹备召开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改组致公党做了大量工作，据当事人的回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恢复致公党总部及活动。（1）在李济深的帮助下，致公党很快与在港的各民主党派建立了联系，“参加香港各党派座谈会”，陈其尤“亦于是时开始参加……籍以决策定计”的各党派领袖“聚餐会”。（2）通过黄鼎臣和中共华南分局取得了联系。“当时华南分局的方方、许涤新、连贯、饶章风都对致公党的重建工作给与了许多帮助和指导，还介绍一些民主人士和中共党员加入致公党，如严希纯同志，就是许涤新同志介绍加入致公党，以协助我（指黄鼎臣）的工作。”（3）通过伍觉天与“在港的中共组织直接接触”，“中共代表连贯同志等亦先后亲至我（指陈其尤）处联络”。（4）“由于陈演生保存着海外致公党支部的通讯处和负责人名单”，由陈演生负责以总部名义同海内外各地组织联系。

（二）成立（党务）“整理委员会”，重新登记党员和整理党务。由1946年冬组建的广州支部承担“三大”的后勤保障和文件印刷工作。在时任中山大学政治系教授雷荣珂指导下，由该系致公党员阮耀民执笔起草党章和党的宗旨等重要文字工作。

（三）统一思想，取得共识。据黄鼎臣回忆，他被邀参加了在陈演生家里召开的致公党中央的干事会。会上大家谈形势，认为致公党应该参加和平民主运动。同中共合作，致力于国内的和平、民

主、团结工作。干事会在这些原则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四）“发表声明阐述自己（致公党）的政治主张”，扩大了致公党在国内外影响。总部恢复甫及启动，1946年6月20日就在《华商报》上发表《中国致公党对时局意见》，声明中国致公党愿与和平民主建设新中国而奋斗的任何党派携手合作。继之，公开发表的其他重要的文件、声明、宣言有：1946年7月6日以干事会名义发表的《致公党组织概况》，《概况》阐述了致公党的由来及其历史演变，肯定了致公党对国家的贡献，阐述了致公党的国是主张，指出，“近为适应潮流与新局势，正在准备迅速召开党员代表大会，讨论党务，修改党章与政纲，并选举中央干事及监事”；11月2日发表的《中国致公党发表时局意见》；1947年1月7日发表的《致公党发言人评美对华政策》；2月27日再次发表的《中国致公党时局宣言》；3月17日发表的《中国致公党声明》；4月4日发表的《致公党为反对美军继续驻华发表声明》。黄鼎臣指出：“这些文件充分表明致公党旗帜鲜明地进行了反对美蒋反动派的斗争，为致公党‘三大’的召开，奠定了政治上、组织上的基础。”

二、“三大”——致公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转折

经中央干事会与美洲南洋等处党部同志交换意见，继谋发展，众意金同，再经多月，函电磋商，终于1947年5月1日在香港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计会期十天，到会之国内外代表，共有四十余人。他们是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劈寰）、雷荣珂（田凡）、钟沃梅（杰臣）、肖重光等。英国的利物浦、美国的波士顿，以及墨西哥、古巴、大溪地的致公党组织委托在港的成员参加这次会议。“此次大会，适当初夏，气候炎热，而海内外代表多名，仍不辞跋涉，远道莅止，聚首一堂，共商大计，其一种爱党爱国之心情，极其真切。”而据黄鼎臣的回忆，“三大”实际是1947年4月下旬召开的。四月底已经闭幕了。但公开宣布“三大”召开的日期却是五月一日。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会上要求陈其尤给蒋介石写一封信，在报上发表，要求蒋介石不要发动内战，要和平民主，后来

万方数据

因为种种原因这封公开信没有发表，“三大”已经开完。发表“三大”文件的时间拖后，所以会期变成五月初了。会场就在香港跑马地，是在严锡煊的家里。严的家当时是致公党的办事处，门口挂了四方形的铜制牌子，上书“中国致公党”。会是在楼上开的。（中共南方局的）连贯同志……关怀并指导了会议。由于当时的局势还是十分紧张的，国民党的特务到处活动，所以会议还是秘密召开的。为了表示同心同德，仍然搞了一次歃血为盟。

有必要指出：黄鼎臣关于“三大”“实际是1947年4月下旬召开”的说法，值得关注。根据新近发现的一则史料记载，“三大”原本定于“五月一日在广东某地召开”。对照4月下旬这一说法，“三大”实际上较原计划是提前就地召开的。其原因并不如黄鼎臣的解释那么简单，而是与“三大”召开前夕，民治党已经步步紧逼地找上门来，欲取致公党而代之这一严重形势相契合。此时此刻，致公党中央本部如果还是按原计划将已经在香港集结的代表转赴广东某地举行“三大”，无异是给民治党让出时间，腾出空间，拱手奉上自身自致公党创建以来的“正统”地位，所以必须提前，就地召开“三大”，尽快承续“法统”。这一就地反击，不仅必要，而且也具备代表已经集结香港的客观条件。“三大”会期的4月下旬说，从存亡绝续这一意义上说，无疑是致公党的一个关键时机。把握住时机也就站稳了脚跟，从而有效地遏止了民治党在香港的渗透。会期的“四月下旬说”，不仅可信，而且蕴含丰富的内涵和信息。

“三大”通过要案多起，其中以修改党章，改总理制为委员制，制定政纲，发表宣言，更选中央执监会，加强组织，等等，最关重要。为适应潮流，针对时局近况，致公党“三大”将最近主张称为新的政纲，公告社会以示本党努力之鹄的，而“就现在使命，简要言之，即争取和平统一与争取真正民主政治二者是也”。新政纲分为总纲，即政治、经济、金融、军队、外交、教育文化、社会救济、侨务等九大部分，详细描绘了致公党的民主建国蓝图。在《宣言》中，致公党强烈谴责以国民党为代表的“买办财阀封建官僚分子……勾结资本帝国主义的美国”，使“中国内战烟火乃弥漫于四方，使全国人民遍遭涂炭之苦”，进而提出“重新召开

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产生各党派联合政府”的主张。明确表示中国致公党将为中国政治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在《告海外侨胞书》中，阐述了必须及如何结束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号召“我海外侨胞一心一德，共策进行，认清前提负起责任，务使国民党之腐化独裁局面早日消灭，各党派联合民主政府，迅速实现，庶内战停止，民生安定”，“海外侨胞方能快见祖国富强与世界各国同享平等自由之幸福”。

为进一步发动致公党成员和海外侨胞投入到国内的革命斗争，大会决定出版《公论》作为致公党中央机关刊物，以发表致公党中央对时局的评论和政治主张。1947年12月《公论》创刊号出版。值得注意的是创刊号刊出的《中国致公党历史及其现在使命》一文。这篇文章虽然是个人的名义，却是代表致公党提请“民主各党派以及各阶层代表”，“尤当正视现实，特别尊重中共地位”。

最后，大会还在组织体制上进行改组，改总理制为委员会制。选举产生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计正式委员19人，候补委员6人。其中，李济深、陈其尤、陈演生、黄鼎臣、雷荣珂、钟沃梅、严锡煊、韩毓辉、伍觉天等9人组成中央常务委员会。大会推选李济深为主席^①，陈其尤为副主席，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陈演生任秘书长，黄鼎臣任组训部长，雷荣珂任宣传部长，钟沃梅任财务部长，韩毓辉任代理侨务部长。设立了香港、马来西亚、美洲三个总支部及二十多个分部。在（香港）礼顿道18号设立中国致公党中央党部临时通讯办事处，籍资联络。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是特别值得纪念的”。黄鼎臣指出：“因为它是本党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次大会从根本上摆脱了旧民主主义思想的束缚，端正了指导思想，重新确立了致公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这是致公党自建党以来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三大”通过《宣言》较为明确地提出了与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一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相通的“致公主张”和实现民族解放、国家富强、人民自由、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新中国的宗旨，以及强调“特别尊重中共地位”等等。这些变化，说明致公党“三大”在中国革命的对象、任

务、性质和领导权等重大问题上开始上升到新民主主义的高度。以“三大”《宣言》为标志，致公党的政治路线开始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在组织路线上也有很大改观，不只是恢复组织，而是重新组合和聚集；也不止于吸收非洪门人士入党，而且还选举他们进入新的中央领导机构。这就使得致公党从上到下，都有了新的血液，新的领导机构也比较健全和有活力，这是致公党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黄鼎臣总结说：“这次大会的政治决议表达了全体同志和所联系的群众要求祖国独立民主繁荣富强的愿望，并引导着我们党所联系的群众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跟上伟大的革命时代奋勇前进。”

三、响应并实践“五一口号”，中国致公党实现新旧民主主义的转变

应当指出：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是一个完整的过程。“三大”不过是迈出了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步，真正实现转变是在1948年。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解放战争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都取得了重大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曙光已经显露在中国的上空。“中国的历史到了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针对当时全国形势的发展，1948年4月3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了《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五一口号”共23条，其中第5条是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五一口号”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诚意和决心，预示着一全新的政党制度的诞生。

“五一口号”一经见报，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异常兴奋。5月5日，由李济深领衔，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和郭沫若等12位民主党派领导人联名通电国内外，热烈响应“五一口号”。电报中说：“南京独裁者窃权卖国，史无前例。复与美帝国主义相互勾结，欲以伪装民主，欺蒙世界。人民虽未可欺，名器不容假借。当此解放军队所至，浆食集于途途；国土重光，大计

亟宜早定。同人等盱衡中外，正欲主张，乃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外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此奉达，即希赐教。”

极具讽刺意义的是，中共发出“五一口号”之日，正是国民党“行宪国大”闭幕，总统、副总统就职之时。国共两党的民主姿态，在社会上造成截然不同的反响，实为“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的真实写照。

致公党在12位领导人“五·五”联名通电后，即“函电本党海内外、美洲、南洋各地党部，切实研究这个重要号召的意义”。6月9日，又单独在《华商报》发表《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宣言》。其他各民主党派纷纷也就“五一口号”发表宣言，表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五一口号”，表现出极高的认同度及参与热忱。

对于致公党来说，6月9日的“宣言”是中国致公党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文献。它见证了中国致公党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这一转变是在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指引和影响下实现的。

（一）确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标志。虽然在6月9日的“宣言”前发表的12位领导人的“五·五”联名通电不是个人行为，是代表各自的党派，但无可否认，6月9日的“宣言”是各民主党派中第一个以党派名义，用文字形式公开宣布自愿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公告。因此，以领导权为衡量标志，6月9日的“宣言”作为历史文献，它见证了致公党已经完成新旧民主主义的转变。根据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的民主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处于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时代，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属于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属于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所谓新旧，主要在于革命领导权的不同，即是不是由共产党领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已经包含了社会主义因素，其发展前途必然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

毋庸讳言，致公党并不是一开始就自愿选择接受共产党的领导，而是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当年选择的艰辛，才有而后的坚信。在历史上，致公党是爱国主义者为捍卫国家独立、民族复兴和民主共和而创立。它的创始人之一陈炯明，在建党前是一位积极支持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在南方发展的“社会主义将军”，然而在酝酿建党和党的“一大”“二大”这一段时间里，他既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也不赞同共产党的主张，甚至把中共列为当时中国的四大祸害之一，希冀在国共两党之间寻求第三条道路而崛起。九一八事变后，他是第一个发出“超越党派，实行国民自决主义，齐集救国旗帜之下，共赴国难”这一声悲壮呐喊的政党领袖。在1933年“福建事变”中，致公党人又旗帜鲜明地提出“联共、抗日、反蒋”的政治主张。以这次事变为契机，推动了致公、中共两党的团结合作，在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斗争中互相支持，结成了友谊。有资料表明，从“三大”开始，致公党与中共的关系就已显示出从团结合作到自愿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转变。继此，致公党又在“五一口号”的统一战线思想指引下遵循中国革命发展的规律，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从此两党关系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

（二）拥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重要内容。在6月9日的“宣言”中，致公党明确表示拥护“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新中国”主张，“本党尤为同意中共这个响亮的号召……它与本党一向对国是主张和奋斗目标是相符合”。表明此时致公党的政治主张与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相一致，并且号召自己的成员为实现民主联合政府而努力奋斗。《宣言》指出，“今天的中国革命少不了华侨同胞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援，在明天新中国的建设中也少不了他们，本党代表他们的利益，因此完全同意中共这次的号召”。华侨同胞“将来可以大踏步地回到民主的祖国的怀抱，参与新中国的各种建设，使中国成为一个独立、自由、康乐的国家”。

需要说明的是，“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是抗日战争中中共及各抗日政党普遍的民主诉求。1944年9月，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国民参政会三届三次

大会上提出“希望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人民团体，开国是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以从根本上打破国民党的训政体制，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抗战胜利后，建立联合政府已成为各民主党派十分明确的主张。中共“五一口号”发布后，立即得到各民主党派的认同，并齐集在“五一口号”的旗帜下，共同为建立新中国而努力奋斗。就致公党而言，是经历了殊途同归的发展过程。致公党“一大”确定的奋斗目标是建立以美国为楷模的“联邦制政府”，以解决中国的统一问题。“二大”的主张是建立各党派平等的“联治政府”，是“联省自治”主张的延伸。致公党的“三大”确定“反对一党专政”，“融合各党各派建立举国一致的联合政府”为奋斗目标。只是在具体设计上依然残留有“联邦制政府”的痕迹，诸如“中央政府采责任内阁制”“实行中央地方均权制”“省为最高自治单位”等等。这说明“三大”的主张还没有完全消除“联省自治”理论的影响，但同时显示出顺应时代潮流，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已有较大的改变。从联省自治——联治政府——联合政府，这系列主张的演变中，体现了致公党对建立现代民主国家体系的探索 and 选择。

“五一口号”发布后，致公党在6月9日的“宣言”中，以鲜明的态度支持中共提出的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这是6月9日的“宣言”的内核，其涵义较之“三大”的主张要深刻得多，其表达不仅完整，而且构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致公主张”。表现在：(1)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前提是结束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南京国民党反动派是无资格参加”“革命与反革命已明显地划分为两个阵营，人民没有第三条道路可以观望”“坚决地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历史决定了独裁者将要走进自己挖掘的坟墓，人民必然获得解放和翻身，新中国已经胎动，将在旧中国的崩溃过程中建立起来！”(2) 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是通过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在“集思广益，相互研讨底下产生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民主联合政府。6月9日的“宣言”所表达的不仅仅是认同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的“共同纲领”，而且强调这是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相互研讨”、

相互同意的“一个完整的共同政治纲领”。(3) 确认中国共产党在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的领导地位。“中共在中国革命艰苦而长期斗争中，贡献最大而又最英勇，全国人民起了先导和模范作用。因此，这次新政协的召开，无疑我们得承认它是领导者和召集人。”

不难看出，6月9日的“宣言”中表达的“致公主张”在对革命形势的观察和判断，对中共提出的革命任务和目标的认同以及对中共在革命中领导地位的确认这一系列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较之一年前发布的“三大”《宣言》和政纲在内涵与意境上大不一样，展示出致公党作为一个政党，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时代感应和责任担当。

“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致公党这一历史性的选择，自有它深刻的“源头”。致公党的先辈作了如下概括：(1) 致公党“继承了先烈的优良革命传统”，“在新的形势下又注进了新血液”^[2]。(2) “完全是因为有中共的影响和帮助”“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今天的致公党”^[3]。(3) 是致公党老一辈领导人“在亲身的社会经历中认识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4]。

四、“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是致公党最重要最根本的历史经验

1957年，黄鼎臣同志为纪念致公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十周年撰写的一篇署名文章中说：“今天，我们来纪念党的历史发展中的转折点的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它的意义不仅在于回顾过去，更重要的是应该总结过去的经验，秉承这次大会要求进步，跟上时代前进的精神来策励我们的将来。”

回顾历史是为着将来。致公党建立之初，由于“对国内外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趋势还没有正确的认识，在国外又深受资本主义民主主义思想的影响，党的政治主张是赞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的”。致公党是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看清楚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同时更认识到对国民党的独裁政权已不可能有任何幻想。反之，大家看到中国共产党坚持领导抗战，抗战胜利后又努力争取符合全国人民意志的祖国和平统一和真正民主的实现。于是认定只有共产党才能完成我们前人一百多年来的

未能完成的革命，才能领导祖国走向独立民主和繁荣富强。我们党必须跟着共产党一起前进才是出路”^[5]。正因为致公党有了这样的认识和思想基础，所以才会在历史转折点上，选择自愿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回顾致公党“三大”这段历史，可以看出，在抗战胜利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历史转折点上，中国致公党选择接受共产党领导，拥护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完全倒向革命一边，从而使自己开始从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支重要力量，为建立新中国作出了历史贡献。同时，也为建国后致公党由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致公党在其自身的政治实践中，深刻认识到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既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发展客观规律，也是有意识、有目的的一种选择。而选择是否正确与否，关键取决于能否遵循客观规律，能否顺应时代潮流，能否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志。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回顾“三大”这段历史，黄鼎臣特别强调：“接受共产党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我们最重要最根本的经验。”

中国致公党正因为有了“三大”的正确选择，并在此基础上才有响应并实践“五一口号”，成功实现由旧民主主义向新民主主义转变的完美结果。与此同时，在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关键时刻，陈其尤为致公党找到了正确的方向，并将其引上了健康发展壮大的道路，成为致公党深孚众望的领袖，获得司徒美堂的赞同：“陈其尤同志等所继续组织之致公党……乃洪门兄弟之良好楷模，必须团结并进”“美堂以洪门领袖地位……当随处呼吁洪门兄

弟予以声援协助。”^[6]

此后，致公党与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形成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也是我国各民主党派共同走过的历史必由之路。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但如果没有历史记忆的积淀，初心的“不忘”和“始终”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全面认识从“三大”到响应“五一口号”这段历史，无疑会促进我们更好地发扬老一辈领导人与共产党团结合作、风雨同舟的优良传统，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为争取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局面作出新贡献！

注释：

- ①“因客观环境关系，对外暂不公开。”“对外之一切活动，均以其尤同志以主席资格出应”——中国致公党中央本部通告复合第五号“附注”。1948年1月1日民革成立，李济深被选为主席。从全局出发，致公党只能割爱。

【参考文献】

- [1]《中国洪门致公党驻美洲总部通告》总通字35第八号[N]. 大汉公报,1946-10-18.
[2]陈其尤.伟大变化的十年间[J].致公通讯,1957(16).
[3]黄鼎臣.回忆“三大”,继往开来[J].致公通讯,1990(10).
[4]司徒擎.亲身的经历,美好的回忆[J].致公通讯,1991(04).
[5]黄鼎臣.永远跟着时代前进[J].致公通讯,1957(16).
[6]中国致公党委员会.中国致公党文件选编(上)[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1995.

(责任编辑：张迦寓)

本刊发表的署名文章均为作者研究成果，文责自负，不代表本编辑部意见。本刊对来稿有编辑修改权，如不同意编辑修改，请特别声明。本刊已加入中国期刊网、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入网期刊、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维普网等，其作者著作权使用费与本刊稿酬一次性给付。如作者不同意将文章编入该数据库，请在来稿时声明，本刊将作适当处理。